

论非洲华人史的中文史料及其利用

李安山

我国对非洲华人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并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以及汇编的史料亦多限于早期南非华工。本文拟对非洲华人史的中文史料和研究状况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值得说明的是，鉴于本文着重在于对史料的探讨，因而提到的论文也是在这一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文章。由于篇幅的关系，对外文史料将另文探讨。

一

从国内的史料来源看，目前可资利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官方档案。大致而言，华人移居非洲大陆和邻近岛屿源于清朝。因此，清朝外务部的档案资料对于研究早期华人（特别是1904—1910年赴南非的契约华工）移民非洲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外务部档案和海关所存资料外，有相当一部分资料已公开发表在《外交报》上。这样，《外交报》成为研究早期华工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外交报》创刊于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停刊于1911年，为旬刊，共出300期。报中的三个栏目对研究早期华工至为重要，即“文牍”、“译文一类”和“交涉录要”。

《外交报》每期均列有“文牍”一栏，刊载各种官方文件或重要的法令、通告。其中即有“南非洲英属特兰斯哇尔招募华工开矿合同”、“南非洲英属特兰斯哇尔招募粤工开矿合同”、“南非英属禁止华工入境新例”等重要文件。每期还有大量的译文，主要译自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的重要报刊。译文分为三类，“译文一类”主要是关于中外关

系和各国对华政策方面的讨论，其中关于南非华工的招募、待遇和政府的政策等主要外论即有多篇。最早的是译自英国的《加甸报》的题为“论非洲宜禁华工”的文章，对赞成从中国输入劳工的论调进行了攻击。此外，大部分《外交报》还列有“交涉录要”一栏，其中专门辟有“华工纪闻”或“华侨纪闻”的栏目。在这些栏目里，不乏关于早期南非华工的消息，既有他们在当地生活的见闻，也有南非针对华工所定苛例的有关报道。

从已公开发表的史料，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有关资料非常重要。第一辑是《中国官文书选辑》，共四册。其中第四册第八篇“南非的华工”共有史料154件，分别收入了外交信函、政府照会、外交文稿、电报、札文、申呈、画押折、咨文等。其中最多的为咨文（43件）、外交信函（41件）和外交文稿（34件）三类。这些资料中包括清朝外务部就华工赴南非金矿事宜与英国方面的外交换文，张德彝（当时的中国驻英大臣）与英国外交部的交涉情况，各地政要（如直隶总督袁世凯）就华工赴南非事宜致外务部的咨文，刘玉麟（中国驻南非第一任领事）和刘毅（中国驻南非第二任领事，关于华工的运送、待遇和生活状况致外务部的报告和信函。尽管这些文件主要是关于华工的，但个别文件也直接提到了当时旅居南非华侨的生活状况，如“署南非洲总领事刘毅为办理华侨禁烟事致外务部申呈”中指出了当时在德兰士瓦和开普敦的华侨吸食鸦片的情况：“每省约千余人，吃烟人数约居十之三四。”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第四辑为《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共分四篇。第一篇为中国人的有关著作选编，其中收入了中国学者陈达的英文著作《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的摘译。这一著作出版于1923年，是为美国政府劳工部提交的报告。其中第八章“南非特兰斯瓦的华工”尽可能地运用了政府文件（包括条约、契约、公约和报告），对此专题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第二篇为外国人的著作选编，其中收入了坎贝尔女士的权威著作《中国的苦力移民》，此书也是发表于1923年。第四章的标题为“特兰士瓦的试验”，书中丰富的档案资料（主要是英国议会文件）表现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这一著作后来成为研究南非华工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的唯一遗憾是第三篇中只提供了华工通过香港和澳门的出洋数字：而我们知道，从1904年起陆续运往南非的劳工很多是从北方招募的，他们是通过北方的港口（如天津、烟台和秦皇岛）出海的。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为《非洲华工》。此辑收入了三种资料。¹⁰第一类为英国报刊关于南非招募华工的时论，既有赞同此举者，也有反对此举者。辑中所有时论均取自《外交报》。第二类为论著选辑。其中包括斯拉威斯基的著作《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华工的政策》（1971年，芝加哥大学）选译、《兰德矿区的华工》选译、张芝联关于南非华工的文章以及陈泽宪关于非洲地区英、法、比、葡、西、德各殖民地招募华工的两篇文章。陈泽宪的文章尤为难得，他治学严谨，旁征博引，为研究被欧洲列强招募到非洲殖民地的华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¹¹第三类为游记，只有一篇，即谢子修的“游历南非洲记”。谢子修（即谢圣宏）系广东开平县人，于1903年10月抵南非，在此居留数年，正值华工赴南非开矿期间。为了打探到华工的真实情况，他辞却所任约翰内斯堡中华会馆书记之职，投

入皇家顾问处司事，“余意尽欲探其内容，非贪其薪俸也。”¹²这篇游记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原始史料。

在《同治条约》《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条约》《海关中外条约》《中外约章新纂》以及陆元鼎编著的《各国立约始末记》和王铁崖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中也有少数涉及这一专题的有关奏折、条约，如“[中英、中法]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外务部奏请以刘玉麟为南非英属总领事折”、“[中英]保工章程”等重要文件。此外，开滦档案中保存了一部分关于招募华工去南非金矿做工的往来信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也卷入了劳工的招募。¹³1960年第2期的《北国春秋》杂志中刊载了一些有关信函和所附合同，对研究1904-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矿务委员会（后称为“德兰士瓦矿务局”）招募华工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¹⁴艾周昌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中的第四部分“华工与华侨”也汇编了一些史料，主要取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和《北国春秋》。¹⁵

二

民国时期的官方资料除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外，主要有政府部门发表的几种公报和杂志。如外交部出版的《外交公报》（月刊，1921年创刊，北京）、《外交部公报》（月刊，1928年创刊，南京）、《外交公报》（半月刊，1940年创刊，南京）、《外部周刊》（南京）等。这些刊物上关于非洲华侨的文章主要由当地领馆提供，大都是关于华侨的活动或领馆与当地政府交涉的情况。如《外交公报》第3卷第12号上的“文书”栏上登了两份关于非洲华侨的文件：一份是南非总领馆就准许当地华侨购买用于垦荒的炸药一事与南罗得西亚殖民政府交涉的文件；另一份是关于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就废除华人用指模代替签字一事与南非政府交涉的文

件。《外部周刊》上的“使领馆消息”栏内也有一些关于非洲华侨的资料。

由中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1932年更名为中央侨务委员会，由国民党直辖）出版的几种刊物也是研究这一时期非洲华侨的参考资料来源，如《中央侨务月刊》《华侨周报》《侨务月报》《侨务周刊》和《侨务季刊》等，其中除提供了一些华侨人口数字以外，还有一些综述性文章。《华侨周报》于1932年创刊，由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负责。其中第一卷第2期发表了何长祺的文章“南非洲侨务之最近观察”，较系统地罗列了南非政府对华人施行的种种苛例，并就外交交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9期刊登了驻南非总领事馆的译文“杜省亚洲人赁居律”，¹⁶使我们对这一种族歧视的立法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第14期刊登的驻约翰内斯堡副领事邵挺的文章则详细介绍了我方与南非政府就亚洲人赁居律一事的交涉过程。¹⁷

《华侨周报》共出了44期，于1933年6月停刊，改为《侨务月报》。每期基本刊登各国华侨的统计数，并经常有各地华侨学校、社团等统计资料。一些文章对了解非洲华侨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如1936年11-12合刊号刊登了“子渔”的文章，对东非葡属殖民地洛伦索-马贵斯的华侨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分为“引言”、“华侨移植的原因”、“目前华侨工商业状况”、“华侨农业状况”、“华侨教育状况”、“华侨与政府的关系”、“华侨团体之一般”和“结尾”八个部分。¹⁸此外，《华侨战士》《华侨先锋》和《华侨通讯》等官方或半官方刊物也有一些资料，但须耙梳整理。例如，在《华侨战士》第八期上刊登了毛里求斯华侨陈伊美写的“模里斯华侨的爱国热”，真实地描述了毛里求斯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日战争的情形。

台湾当局方面发表的资料是另一类官方史料，这一般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例如，由国民党党史会所编的《革命文献》中即有关

于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情况。由台湾国民党中央第三组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在海外》中的下篇即有关于“马达加斯加直属支部党务沿革概要”的内容。此外，由台湾半官方机构“华侨志编纂委员会”于1956年出版的《华侨志（总志）》一书也涉及了非洲华侨特别是南非华侨的情况。台湾“侨务委员会”《华侨经济年鉴》从1958年起发行至今。其中收集的关于非洲华侨经济方面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些有关国民党的党史著作也有相关的史料。¹⁹

华侨或历史人物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也是重要史料之一。较早的有上面已提到的谢子修的“游历非洲记”，此外还有叶迅的“南非华侨情况忆述”²⁰和刘新的“我在毛里求斯的见闻”²¹。这些都是作者关于本人经历的记载或回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冯自由的著作中也提到了早期华侨对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贡献。如在《革命逸史》中，冯自由记述了革命先驱杨衢云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和彼得马里茨堡两地建立兴中会的情况。²²南非侨领霍次狂曾向台湾国民党中央提供过一份关于南非华侨早期革命活动的报告，对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南非华侨的思想动态有一定参考价值。²³此外，在《新民丛报》《东方杂志》《南大与华侨》等时刊上也登载了一些非洲华侨的来信或来稿，描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东方杂志》是早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杂志，也有关于非洲华侨的资料。如第一卷第10号极全面地介绍了1904年开普敦政府对当地华侨的限制法令。同一期上还有一篇转载于《中外时报》的专论，这很可能是我国知识界对这一事件的首次严肃反应。作者对南非苛例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无情批判了清政府的弃民政策，“今则初往之华工，情状如何，尚未可知，而久居彼地之华人，则直无旦夕相安之势，不政府之咎，而谁咎耶？坐以弃民之罪，其又奚辞。”²⁴笔者在研究非

洲华侨史时得到的国内最早关于全非华侨的统计数字即来自这一杂志。此刊在前期还辟有“各埠华侨近况”和“华侨商务”的栏目，如第七卷第6期的“各地华侨近闻”中就有关于南非德兰士瓦华侨组织维益社²⁵抗例代表梁萃轩因反抗苛例而遭坐监判罚苦工的消息。

《南大与华侨》是国内关于华侨问题的专门杂志，由当时地处广州的岭南大学主办。该刊虽然主要介绍的是美洲和南洋的华侨，但也发表了一些关于非洲华侨的通讯和文章。如第八卷第3期刊登了李毓尧致农矿部部长的信。李君当年被派往南非列席万国地质学会，对于该地华侨倍受白人虐待情形，目击心伤，不忍缄默，特致函部长，“准予转咨外交部，设法交涉。”此外，《南洋研究》（1928年创刊）、《南洋情报》和《中南情报》（1934年创刊）是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后改为海外文化事业部）创办的华侨研究刊物。这三种刊物上间或刊登一些有关非洲华侨的文章。如《南洋情报》第一卷第3期由毛里求斯中华小学的教师管仲方所写的“华人初到毛里寺岛之考证”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此问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²⁶

一些非洲华侨自己办的华文报纸可谓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据笔者所知，南非华侨的《侨声报》创刊于1936年6月1日，其覆盖面较广，其报道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南非一地。毛里求斯的华侨报纸甚多，最兴旺的50年代多达5种，计有《华侨商报》（1926年9月7日创刊）、《中华时报》（1932年8月11日创刊）、《中国时报》（1953年12月10日创刊）、《新商报》（1956年3月8日创刊）和《国民日报》（1958年10月31日创刊）。²⁷此外，毛里求斯华侨还办有《镜报》周刊（1975年4月14日创刊），²⁸马达加斯加有华文《民锋》半月刊（1947年2月15日创刊），²⁹留尼汪华人办有三语杂志《曙光》。³⁰国内所收集的非洲华侨中文报刊多为五六十年代的。

国内的报纸也是一种资料。1949年以前的报纸对非洲华侨的介绍可谓凤毛麟角，但并非毫无涉及。《申报》在1931年曾刊登过麦克尼尔所著《海外华人的地位及其保护》一书的摘译，其中即有关于非洲华侨的统计数字。³¹此外，在1936年南非华侨归国请愿代表团抵沪时，《申报》曾作过追踪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大报和解放区报纸对非洲华侨支援国内抗战的消息多有报道。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曾分别报道过毛里求斯、南非和马达加斯加华侨为抗战、伤兵之友活动和救济难民积极捐款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出版过关于华侨的日报。1956年创刊的《侨务报》有少量关于非洲华侨的文章。³²1983年1月创刊的《华声报》（于1982年7月试刊）和《广东侨报》（1956年创刊，1979年复刊）也有关于非洲华侨的消息或报道。

三

另一类资料是研究论著。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非洲华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1904-1910年在南非金矿工作的华工上。1949年以前，这一研究可谓微乎其微。陈达利用国外资料写成了《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1923年，华盛顿英文版），其中第八章对南非华工状况作了较详细的阐述。这是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对非洲华工的最详细的论述。此外，李长傅的《华侨》（1927年）和《中国殖民史》（1936年）、何汉文所著《华侨概况》（1931年）以及丘汉平的《华侨问题》（1936年）等著作分别涉及了非洲的华侨和华工。尽管篇幅很小，绝大部分仅提及非洲华侨的大致数目，但这些著作却反映了我国学者对非洲华侨的早期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宓亨利（即麦克尼尔）的《海外华人的地位及其保护》的翻译本于1928年以《华侨志》为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长野朗于1928年在

参考了李长傅所著《华侨》和宓亨利的著作的基础上写成了《支那民族之海外发展》一书,较详尽地论及华人移民世界各地的情况。该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而后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大学获政治学硕士的黄朝琴立即将其翻译出版(1929年),书名改为《中华民族之海外发展》。书中也提到了南非的华人。此书于1983年由台湾的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作为《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六集》重印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先对南非华工进行研究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芝联。他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运用中外史料揭示了1904-1910年间“南非华工问题”的真相,并对国外汉学家的传统解释进行了批驳。³³1963年,陈泽宪在“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中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欺骗与暴力手段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文中提到了被骗至欧洲列强在非洲殖民地的华工。³⁴这两篇论文史料翔实,从宏观的角度对华工出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遗憾的是,后来的政治运动使各种研究活动不得不停下来。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8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由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如前所述,涉及非洲华工的有三个部分。

对南非华工研究较深的是《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彭家礼。1980年他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从宏观的角度对华工出国的原因、贩运的类型、清朝的政策以及华工的分布进行了探讨,文中论及了南非的华工。1983年,他又在《历史研究》上撰文,专门探讨了清末英国为南非金矿招募华工的情况。他不仅充分地使用了英国议会文件和清朝政府的档案,而且尽量吸收了国外学者70年代的研究成果,这

是十分难得的。³⁵1980年美籍华人学者沈已尧经过增补再版的《海外排华百年史》翻译出版,其中的第七章论及华工在南非的沧桑。³⁶华东师大的艾周昌于1981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近代华工在南非”,对华工输入南非的原因和华工的待遇进行了探讨。³⁷

以往对南非华工的研究多从资本主义扩张或帝国主义侵略的角度入手,谴责英国或南非政府为多,对清政府略而不提或一笔带过。1984年,徐艺圃运用大量的清朝档案,探讨了外国政府和清政府在清末南非招工案中的勾结,并提出了从中国南北各地被拐骗到南非的劳工比学者一般估计的要多得多,“以往不少学者仅仅根据经天津、秦皇岛出洋的统计为五万五千人,这显然是十分不完全的数字。而我们根据现存档案提供的资料分析,估计至少在十五万左右。”尽管这一结论还有待论证,但此文是一篇史料翔实见解独到的论文。³⁸还有的学者对清末输入到比属刚果的华工的情况和华工在法属非洲殖民地修筑铁路的史实进行了初步研究。³⁹

对非洲华侨(而非早期华工)的研究始于为政府部门提供咨询的一种内部资料性整理工作。笔者所见到的最早的资料是《亚非地区华侨情况介绍》,其中对南非联邦、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华侨情况作了介绍。⁴⁰60至70年代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的。1978年以后,报刊杂志的增多为华侨研究提供了条件。新闻工作者以其实地采访的优势和对资料使用的便捷率先注意非洲华侨。关于非洲华侨的报道、回忆和文章不断出现在《华声报》《华侨历史学会通讯》和《侨史资料》等报刊上,一些文章颇有参考价值。⁴¹方积根和李秀华于1985年在《华侨历史学会通讯》上公开发表了“马达加斯加华侨历史与现状”一文。⁴²除了对马达加斯加华侨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外,方积根还组织对一些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进行了翻

译, 出版了《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⁴³ 从而为非洲华人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除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外, 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台湾当局于1955年开始对海外华侨的经济情况进行调研, 首先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地设立了“经济通讯网”⁴⁴, 并随之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1954年, 台湾“侨务委员会”顾问萧次尹到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活动, 并得到了当地华侨(如南非的廖纲鲁、葡属东非的容学英等)的帮助,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非洲华侨经济》(1956年), 其中关于英属中非、英属东非和葡属东非的部分尤其难得, 可以说在这一研究领域填补了一个空白。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编写了《南非联邦与华侨》(1960年), 由台湾半官方机构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由何静之主编的《留尼旺岛华侨志》也于1966年出版。此外, 台湾出版的《华侨经济参考资料》和《侨务月报》上也有关于非洲华侨现状的参考资料。

在七八十年代, 台湾学者和海外的华人学者也出版了一些中文论著, 宋对清末华工在南非的研究⁴⁵, 陈铁魂的《马拉加西华侨概况》(1989年)、陈英东的《模里西斯华侨概况》(1989年)等以及陈怀东的《海外华侨经济》中也有一些篇幅论及非洲华侨的经济。⁴⁶ 此外, 一些海外华人学者也对自己祖先在当地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探讨。如毛里求斯的华人外交官兼学者曾繁兴对该地华人的历史进行了考察。⁴⁷ 还有的学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来, 如曾侨居坦桑尼亚的曲拯民写的“中国人在东非洲造铁路”将自己少时所闻、在坦桑尼亚的所见记录下来, 提供了关于1898-1914年德国人在东非雇佣华工修筑铁路的史实。⁴⁸

进入90年代以来, 对非洲华人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在论及非洲华人的文章中, 有的探讨西印度洋诸岛的近代华工, 有的分析非

洲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活动, 有的研究非洲华人和华侨的生活情况, 有的介绍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挣扎的南非华侨。⁴⁹ 赖翠玲的《嫁到黑非洲》(1996年)以自传的体裁, 记述了作者本人在非洲的亲身经历。侨居南非的欧铁出版了《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1991年), 由于作者曾在南非任教, 有机会接触一些当地华侨, 所以他的著作用了一些新的资料。在《中非关系史》一书中, 作者描述了清末以来非洲华工的境况, 同时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非洲华侨的贡献。⁵⁰ 《人民日报》社驻南非记者温宪撰写的“南非华人创业史”, 从1997年7月起在《华声》月刊上连载六期, 较详细地介绍了南非华人的奋斗历程。这篇重要长文的资料主要来自南非华人学者叶慧芬和梁瑞来的近著《南非华人史》。⁵¹

从80年代后期始, 一些综合性的华侨研究著作或参考书均注意将非洲列入。葛仁局首先在著作中提及在非洲的中国人,⁵² 随后, 李原、陈大璋的《海外华人及其居住地概况》(1991年)、方雄普、谢成佳的《华侨华人概况》(1993年)和巫乐华的《华侨史概要》(1994年)均论及非洲。此外, 一些关于华侨报刊和各国对华侨政策的专著也涉及到非洲华人。⁵³ 由周南京、梁英明主编的《世界华人华侨大辞典》(1993年)是一部极有份量的参考书, 其中即有涉及非洲华侨的内容。1995年出版的《世界华人精英传略: 大洋洲与非洲卷》分别介绍了梁金⁵⁴ (南非)、邓军凯(毛里求斯)、陈福胜(马达加斯加)、沈文伯(尼日利亚)等人的传记。

最后谈一下在使用史料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 在使用史料时, 要尽可能地核对原文或原件。陈翰笙先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是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华人最有份量的史料汇编, 但也有一些错误。例如, “土工”误作“士工”, 这显然是排版错误。⁵⁵ 又如, 《中国佬约翰在兰德》的作者为“一个英国见证人”(An English Eye Witness), 是

由约翰·克利福写的前言。⁵⁶但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译者误认为此书的作者是约翰·克利福。⁵⁷再如《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中引用的“非洲各属华侨人口统计表”是一份十分难得的资料，然而，表中却有两处错误：英属南非洲海岛“其他”一栏之“合计”应为“143”，而不是“43”；英属南非洲“其他”一栏之“男童”应为“12”，而不是“2”，⁵⁸这也很可能是排版错误。

第二，地名的准确性十分重要。其一，一些非洲地名因翻译年代（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和使用地域（非洲本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不同，有各种不同译名或称呼。Mauritius 即有毛里求斯、毛里寺、毛里西亚、模里斯、模里西斯、毛岛等译名，如果不清楚，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其二，一些地名的译名要查清楚，不要望文生义，更不要以讹传讹。如中国古籍中的“竹步”是指今索马里境内的朱巴河口一带，这早已有定论。⁵⁹1994年5月2日的香港《快报》上一篇文章提出：“南非的历史上都记载着‘1412年郑和下西洋抵达竹步’，‘竹步’即是今天的‘祖鲁’；考证位置是今天的德班港。”国内有的学者在没有进行任何考证的情况下即采取了这一说法。⁶⁰这是不妥当的。

第三，引用史料一定要注明出处。有的学者在引用他人著述中的档案资料时或不注明出处，或直接使用档案资料的原出处，这不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困惑和不必要的困难，而且在治学上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在日益重视知识产权和学术研究要与国际接轨的今天，再次强调这一点决非多余。

（作者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教授）

注释：

《外交报》，第79期，1904年6月8日。

《外交报》，第82期，1904年7月8日。

《外交报》，第97期，1904年12月1日。

《外交报》，第25期，1902年10月6日。此文原载于1902年9月1日《加甸报》。

此报于1914年由上海外交报馆分类以《外交报汇编》为名重新出版，共有28册。其中第3至第5册为译报一类，有关中非关系的译文集中在第3、4册，主要是关于华工在南非的待遇。第22册为“交涉录要”。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四册，第八编，第1643-1792页。

同上书，第1785页。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中华书局，1981年，第68-87页。

同上书，第407-460页。“特兰士瓦”今译为“德兰士瓦”，下同。

10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非洲华工》，中华书局，1984年，第73-289页。

11 陈泽宪：“1904-1910年英国为南非特兰士瓦金矿招募华工史料辑存”，“非洲地区英、法、比、葡、西、德、各殖民地招募华工纪略”，同上书，第178-253页，第254-277页。

12 同上书，第278页。

13 卷入为南非招募华工的还有太古轮船公司、仁记洋行、瑞记洋行、美孚洋行、陈庆凯公司和几个口岸的洋务局等。

14 “前开滦矿英、比帝国主义分子贩卖华工的一些资料”，《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第76-85页。

15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第209-279页。

16 “杜省”即 Transvaal，今译为“德兰士瓦”，南非地名。此译文在第21期上再次全文刊登。

17 邵挺：“南非杜省亚洲人赁居律交涉之经过”，《华侨周报》，第14期，第9-15页。

18 子渔：“东非洲罗连士麦埠华侨一瞥”，《侨务月报》，1936年11-12月合刊号。

19 如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上、下卷），台北，1981年。

20 叶迅：“南非华侨情况记述”，《文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87辑（1983年），第81-95页。

21 刘新：“我在毛里求斯的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47辑（1986年），第43-60页。还可参见刘新：“漫谈毛里求斯华侨教育”，《华侨教育》，第1辑（1983年4月），第188-191页；“三记毛里求斯散记”，《今日中国》，1995年8月号，第56-57页。

22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四集，第16-17页。

23 梁次狂：“南非洲党务实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馆藏原件），转引自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434-435页。

24 “书南非英属禁止华工入境新例后”，《东方杂志》，1：10

(1904年12月),第161-164页。

25 维益社正式成立于1908年,以联合南非印度人反对当时针对亚洲人的苛例。

26 管仲方:“华人初到毛里求斯之考证”《南洋情报》,1:3(1932年12月),第89-90页。

27 参见郑民等编:《华侨华人史书刊目录》,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254-255页。关于此书提供的资料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关于《中国时报》的创刊日期(1946年)有误,应为1954年12月10日;第二,关于《华侨商报》与《中国时报》合并的日期(1953年)有误,应为1955年9月16日。

28 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有近十几年的《镜报》。

29 此刊由马达加斯加兴文学学校学生创办;1956年7月15日因经济原因暂时停刊。1957年8月1日复刊,1960年改版后内容更加丰富。见《国民日报》(毛里求斯),1962年1月26日。1975年停刊。

30 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L'Hamattan, 1996, p. 333

31 “海外各处华侨历史与现状”,《申报》,1931年8月28日。

32 如张芳:“华侨在非洲”,《侨务报》,1964年第1期。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从1950年8月10日开始出版内部刊物《侨讯》(周刊,后改为每周两期;后更名为《侨情参考资料》),也有关于非洲华侨的通讯。

33 张芝联:“1904-1910年南非英属德兰斯瓦尔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第77-96页。

34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161-179页。陈泽宪也参加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编撰工作。

35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第3-13页;“清末英国为南非金矿招募华工始末”,《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177-192页。

36 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1-148页。

37 艾周昌:“近代华工在南非”,《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171-190页。

38 徐艺圃:“清末英属南非招工案初探”,《文献》,第22期(1984年),第67-81页。

39 艾周昌:“一八九八年中刚(扎伊尔)条约与华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第169-171页。彦非:“华工与刚果——大洋铁路”,《非洲研究资料》,9(1984年),第1-6页。

40 华侨问题研究会:《亚非地区华侨情况介绍》,1955年3

月,第233-258页。

41 例如孙星文:“记兴建刚果——大洋铁路的华工”,《华声报》,1984年8月19日;奚学瑶:“秦皇岛输出南非华工论略”,《华声报》,1985年1月1日。

42 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5年第2期。此文首先是作为内部资料发表于1982年1月29日的《参考资料》上,后又辑入《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一书。

43 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

44 《华侨日报》(毛里求斯),1955年12月20日。

45 宋:“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台北,1974年。

46 陈怀东:《海外华侨经济》,台北:黎明,1986年,第33-57、170-175、209-211、312-316、345-346页。

47 曾繁兴(邓抗升译):“寻根:毛里求斯的华人”,《明报月刊》,1980年第1期,第40-41页。译者邓抗升是著名的非洲侨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洲区代表邓军凯之子。

48 曲拯民:“中国人在东非洲造铁路”,《明报月刊》,1981年第11期,第69-75页。

49 余建华:“近代契约华工输入西印度洋诸岛探析”,《西亚非洲》,1991年第1期;杨力:“福建华侨移居非洲史略”,《侨史资料》,第9期(1991年11月);许永璋:“毛里求斯的华工和华侨”,《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廖小健:“种族隔离与南非华侨华人”,《八桂侨史》,1993年第4期;董悦华:“1910年以来的非洲华人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李小玲:“非洲华侨与祖国抗战”,《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2期;林金枝:“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八桂侨史》,1995年第2期;周南京:“南非华侨华人教育概述”,《八桂侨史》,1997年3期。

50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6-159、202-213页。

51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52 葛仁局:《炎黄子孙在海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44页。

53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60-266页;杨力:《海外华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316-323页;廖小健:《战后各国对华侨华人政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5-377页。

54 此为误译,其姓名实为“梁佐钧”,英文名为Leong Quin。见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151。此页所附图片中有梁佐钧的中、英

文名。

55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非洲华工》,第102页;原件见《外交报》,第76期(1904年5月10日),第15页。

56 An English Eye Witness: *John Chinaman on the Rand*, London: R. A. Everett & Son, 1905

57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非洲华工》,第107页。译者将书名译为《兰德矿区的华工》。

58 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18页;原件见《中央侨务月刊》,第7-8号合刊(1930年4月),统计,第6

页。

59 “竹步国”见《明史》卷326《外国卷》七。关于其地理位置,参见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修订版)第85页;黄盛璋:“中国与索马里的传统友好关系”,《世界历史》,1981年第3期,第59-66页。

60 白灵:“从种族隔离夹缝中走过来的南非华人”,《八桂侨史》,1994年第4期,第45页。实际上,郑和在1412年根本未出洋。其第三次出洋时间为永乐7-9年(1409-1411年),第四次出洋时间为永乐11-13年(1413-1415年)。

·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讯 ·

1999年2月4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假座和平里华文饭店召开在京理事及侨史人士迎新团拜会。会议由方雄普、赵红英同志主持。张楚琨会长首先致辞。他对一年来学会的工作和成绩作了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展望,指出侨史学会过去一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的一年里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侨史工作是大有可为的。接着,中国侨联副主席、学会副会长朱添华同志,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学会副会长姚美良先生,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学会副会长彭光涵同志,原全国侨联副主席、学会副会长萧岗同志,先后讲了话。会上,周南京副会长还介绍了《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进展情况;黄小坚副秘书长介绍了今年8月拟在广州召开的、有海峡两岸学者参加的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情况。出席团拜会的还有来

自广州、厦门、上海的外地学者和首都新闻单位记者共约50人。姚美良副会长并赠送了精美的礼品。

在此次会议上,赵红英同志被增选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赵红英同志曾在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工作多年,此前任职于中国侨联机关。因工作需要,被中国侨联党组任命为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研究所和学会的全面工作。原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方雄普同志因外事工作需要,已借调中国驻缅甸使馆工作。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秘书处)